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题解	1
第二节 地面寺院的发掘和研究简史	3
第三节 资料收集与实地调查	6
第四节 研 究 思 路	7
第二章 图木舒克地面佛寺	10
第一节 考古发掘与研究简史	10
第二节 佛寺遗址现状	11
第三节 佛寺建筑类型	18
第四节 寺院布局	22
第五节 年代	24
第三章 夏合吐尔和乌什吐尔地面佛寺	31
第一节 考古发掘与研究简史	31
第二节 佛寺遗址现状	32
第三节 佛寺建筑类型	37
第四节 寺院布局	40
第五节 年代	43
第四章 苏巴什地面佛寺	47
第一节 考古发掘和研究简史	47
第二节 佛寺遗址现状	48
第三节 佛寺建筑类型	61
第四节 寺院布局	64
第五节 佛塔形制	65

第六节 年代	68
第五章 焉耆锡格沁地面佛寺	69
第一节 发掘和研究概况	69
第二节 佛寺遗址现状	71
第三节 佛堂建筑类型	82
第四节 年代	83
第五节 寺院布局	88
第六章 高昌故城地面佛寺	89
第一节 考古发掘和研究简史	89
第二节 佛寺遗址现状	90
第三节 佛堂建筑类型	105
第四节 佛堂的形制渊源和族属	107
第五节 年代	116
第六节 寺院布局	118
第七章 交河故城地面佛寺	119
第一节 考古发掘和研究简史	119
第二节 佛堂建筑类型	120
第三节 寺院布局	124
第四节 年代	126
第八章 胜金口地面佛寺	129
第一节 考古发掘与研究简史	129
第二节 佛寺遗址现状	129
第三节 佛堂建筑类型	139
第四节 寺院布局	140
第五节 年代	141
第九章 白杨沟地面佛寺	144
第一节 考古发掘与研究简史	144
第二节 佛寺遗址现状	144
第三节 佛堂建筑类型	150

第四节 年代	153
第五节 寺院布局	155
第十章 结语	157
第一节 地面寺院的地域划分与所属宗派	157
第二节 地面寺院建筑的渊源	162
第三节 地面寺院建筑与石窟	166
第四节 地面寺院与交通	168
参考文献	171
附录 丝绸之路南道佛寺研究	178
Abstract	190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题 解

新疆位于我国西部，地处亚洲腹地，东接河西走廊，西至帕米尔高原。所谓西域，传统上广义的定义是指玉门关以西包括整个新疆在内的广大中亚区域，而狭义定义上的西域最早按《汉书·西域传》所载，是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帕米尔高原）以东，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也就是新疆南疆的塔里木盆地和东疆的吐鲁番盆地及哈密盆地，而此后历朝历代有关西域的概念和范围都有所变化，一般而言，历代中央政府能管辖到的地方都可视为是狭义西域^①。习惯上，通常以天山为界，把新疆分为南疆和北疆两部分。北疆为草原荒漠地带，南疆为绿洲和沙漠地带。

天山南边的塔里木盆地为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一词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于19世纪末提出，指东起中国中原地区，西至罗马帝国地中海之滨，横跨亚欧大陆的商贸之道。这一提法一直被国际学术界沿用至今。丝绸之路的开辟，一般以公元前2世纪张骞凿空西域为标志。《汉书·西域传》中把经过新疆境内的丝绸之路分为南、北两道：“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由此可知沿天山南缘为北道，主要国家有车师（后为高昌）、焉耆、龟兹、疏勒诸国；沿昆仑山北缘为南道，有于阗和楼兰（东汉初改名鄯善）诸国。魏晋南北朝时，按《三国志》卷三十注引《魏略·西戎传》记载，这个时期丝绸之路又开辟新道。这条道路从玉门关西北行，绕三陇沙和龙堆，经五船等地到达高昌，复西行与中道合于龟兹。中道为汉代的北道，因这条新道的开辟而改名。

地面寺院（freibautentempeln）一词最早由勒柯克（A. von Le Coq）提出，以区别开凿于山体崖面的石窟寺院（Höhlentempeln）（Le Coq, 1924）⁹⁻¹⁰。地面寺院大多平地起建，使用土坯等建筑材料，不像石窟寺院凭借山崖开凿建筑，在布局上显得更灵活、充裕，在形制、组合上也更多样化，极具研究旨趣。

公元前6世纪，佛陀于鹿野苑初转法轮，作为人类文明之一的佛教开始流传于世。

^① 本书中的西域指狭义上的西域，中亚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地区。

佛陀涅槃之后,佛教经历两次大的发展,一次是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另一次是2世纪贵霜王朝迦腻色伽时期。在迦腻色伽的支持下,佛教在贵霜王朝中心的犍陀罗和迦湿弥罗地区进行了第四次结集(季羨林等,2000)³³¹⁻³³³。这次结集产生了一些佛教经典,特别是早期的大乘经典,加入了中亚伊兰系民族的一些宗教信仰特色,而和原来恒河流域的印度佛教有所差别。同时在原先大夏希腊人雕刻神像、人物传统的影响下,对佛的偶像崇拜开始出现。随着佛像崇拜的兴盛,贵霜王朝统治地区的寺院形制也和恒河流域不同(晁华山,1994)¹⁶⁵⁻¹⁷¹。也就在这个时期,贵霜王朝境内的高僧大德纷纷以向外传播佛教为自己的使命,毗邻贵霜帝国的西域便是首选之地,他们跟随商人的驼队,越过大雪山和帕米尔高原或冒险徒步穿越克什米尔北部印度河上游河谷,到达疏勒、于阗、龟兹、高昌等古代绿洲国家,然后建筑寺院,弘扬佛法。贵霜时期(1~3世纪)以及后贵霜时期(3~5世纪),大致相当于我国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已经畅通,中原和西域交流十分频繁,佛教也就经西域开始进入中国内地。从文献记载看,自东汉末至南北朝初期,到中国内地传播佛教、翻译佛典的高僧主要来自贵霜王朝地区和西域诸绿洲国家^①。可以认为,中国早期的佛教是受中亚地区佛教影响,而非印度本土佛教的直接影响。虽然中亚佛教在贵霜帝国衰亡后的4世纪仍保持对外影响的势头,但到五六世纪的时候,由于入侵的白匈奴(哒哒人)实行灭佛的政策,中亚的佛教开始衰落下去,直至唐代才有所恢复。中亚贵霜佛教在衰落之后,其中心也就慢慢移至西域,在这段时期,佛教在塔里木盆地十分兴盛。各个绿洲国家的国王贵族纷纷布施祈福,建立大规模的佛教寺院供养佛、法、僧三宝,甚至一些王族子弟出家成为高僧。大批的胡僧携带胡本佛经进入中原,这些高僧与胡本佛经和西域的绿洲国家都有一定关系。从全世界范围看,4~6世纪这段时间是佛教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而这个时期西域是除印度笈多王朝、中国十六国南北朝之外的一个主要的佛教中心,所以西域佛教在佛教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西域佛教的兴盛与这个时期丝路繁荣,各个绿洲国家经济发达、文化昌盛是息息相关的。唐朝经营西域安西四镇时,佛教在西域进一步发展。从10世纪起,随着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朝在中亚兴起,伊斯兰化的浪潮很快波及整个西域地区。至14世纪时,佛教最终在西域绿洲消亡。

经过多年来人为的破坏和自然环境的变迁,西域昔日繁华庄严的寺院或已成为废墟,或已湮灭于大漠瀚海之中。从新疆现存的佛教遗址看,几乎一半为地面寺院遗址,这些遗址是我们研究当时佛教盛况的基本材料。

① 这个时期到中原弘扬佛法的著名高僧来自贵霜的有安世高、支谶、支曜、康僧铠、康僧会、竺法护、支法度、支道根、支施苍、佛驮什、昙无谶等人;来自西域绿洲国家的有帛延、天罗叉、帛尸梨密、帛法矩、佛图澄、鸠摩罗什、昙摩等人。以上参见《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

第二节 地面寺院的发掘和研究简史

一、调查和发掘简史

有关新疆地面寺院遗址的调查、发掘可分为下面四个阶段。

1.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起, 西方国家开始关注新疆, 在新疆进行了一系列调查、探险活动。

真正意义上的考古探险是由瑞典人斯文·赫定 (Sven Hedin) 揭开序幕的。他于 1895 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发现丹丹乌里克遗址, 这一发现引起西方学界对新疆古代遗址的注意。1898 年, 俄国人克莱门兹 (D. Klementz) 首次专门考察吐鲁番的古代遗址, 并于 1899 年在彼得堡俄国科学院做相关报告。在这之后英国人斯坦因 (M. A. Stein), 法国人伯希和 (P. Pelliot), 德国人勒柯克、格伦威德尔 (A. Grünwedel), 俄国人奥登堡 (S. F. Oldenburg), 以及日本大谷探险队等均在新疆做过考古调查发掘。

斯坦因在 1901~1914 年做了三次考察, 主要调查、发掘区集中于丝路南道的于阗、鄯善和北道的焉耆、吐鲁番、哈密地区的地面佛教遗址, 主要地点有喀什、和田的约特干、热瓦克, 于田东北部的达玛沟、丹丹乌里克、尼雅、安迪尔、米兰、楼兰、营盘, 焉耆的锡格沁明屋以及哈密的上庙尔沟。

伯希和 1906~1908 年于塔里木盆地调查、发掘的主要地点是巴楚县托古孜沙来寺院遗址和库车地区的夏合吐尔 (都尔都尔阿库尔) 遗址与苏巴什遗址。

德国考察队由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率领, 1902~1914 年先后在新疆进行了四次发掘。德国考察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吐鲁番地区的高昌故城、胜金口、伯孜克里克、吐峪沟和库车地区的克孜尔、库木吐喇等地, 在哈密的白杨沟、焉耆的锡格沁和巴楚的图木舒克塔格也进行过发掘。

1909~1910 年, 俄国再次派遣探险队考察新疆古代遗址, 探险队由俄国科学院院士奥登堡率领, 主要考察地点为吐鲁番、焉耆和库车。

与上述西方探险队考察时间同期, 日本大谷探险队也进行了三次探险活动: 第一次是 1902~1904 年, 由渡边哲信和崛贤雄进行; 第二次是 1908~1909 年, 成员是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 第三次是 1910~1914 年, 成员是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

在这股探险热潮中, 许多古代佛寺遗址相继被发现, 出土的大批雕塑、壁画和文书全部流失海外。1900 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 斯坦因和伯希和等人利用看守人王道士的无知, 盗走大部分经卷和其他文物。陈寅恪先生回顾这段历史时, 感慨称之为“吾国学术伤心史”。

2.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对外国探险家在新疆的活动加以禁止。因此，这阶段国外探险家的考古发掘不如第一阶段之频繁。其中主要有：1928年德国人特林克勒（E.Trinkler）在古于阗国统治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主要地点有热瓦克、巴拉瓦斯德等地；法国人哈金（Joseph Hakin）于1931年考察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

新疆大批文物的流失也使当时中国学术界深受刺激。不少有识之士不断呼吁保护国宝和关注西域的考古发掘。1927年，以黄文弼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为标志，我国学者也开始在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从1928年1月~1930年8月，黄文弼在哈密、吐鲁番、焉耆、库车、拜城、巴楚、于阗等地对佛寺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另外，1916~1917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官员谢彬到新疆调查财政状况，同时也关注新疆各地的历史、地理、民俗等。他所撰的《新疆游记》中对部分地面寺院遗址有所记载。

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文化大革命”期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考古学界继续关注新疆佛寺遗址，但相关的考古发掘并不多。其中主要有：20世纪50年代，黄文弼对塔里木盆地各个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其中包括对焉耆锡格沁明屋遗址和库车苏巴什遗址的重新发掘；20世纪60年代，中国佛教协会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组成新疆石窟调查组，以阎文儒先生为负责人，对天山以南的佛寺遗址进行调查，其中包括锡格沁明屋地面佛寺遗址。

4.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至今

这段时期佛寺考古研究工作成果显著。除石窟寺考察外，主要有关地面寺院的发掘有：1979~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吉木萨尔北庭高昌回鹘寺院遗址；1993~199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交河故城发掘西北小寺和一座地面寺院遗址；1995年，中日学者联合对尼雅遗址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发掘了一座包括寺庙、僧房、民居、院门的寺院遗址；1996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法国科学院联合调查发掘克里雅河下游的喀拉敦遗址，发掘了两座寺院。

二、研究简史

由于新疆文物流失于世界各地，在客观上也使西域佛教艺术史研究走向世界，许多国外学者开始致力于这块新领域的研究工作。国外有关新疆地面寺院的研究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限分为两个阶段。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这一阶段国外学者主要进行的工作是编写报告、整理相关发掘资料，以及撰写个人游记。

斯坦因的三本考古报告《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皆涉及地面佛教寺院。作为一个受过考古专业训练的学

者,斯坦因的发掘工作相当细致,他对所能观察到的各种现象和遗迹、遗物进行详尽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对遗址的性质和年代进行判断。由于当时中亚佛教考古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当时和后来的地面寺院考古材料斯坦因并不知晓,所以斯坦因没有进行较大范围的综合研究,特别对佛教寺院的布局和形制基本上没有涉及。

1904年格伦威德尔回到德国后,即撰写了《1902~1903年亦都护城及周边遗址考古报告》(*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一书,内容主要是介绍吐鲁番地区的地面寺院。在这之后,格伦威德尔还撰写了考古报告《中国新疆古代佛教圣地——1906年至1907年在库车、焉耆、吐鲁番绿洲的考古工作》(*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e-Turkistan*)和研究专著《古代库车》(*Alt-Kutscha*),这两本著作主要对新疆的多处石窟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包括洞窟形制、壁画题材及其分布、现存状况、出土遗物等;地面寺院并不是重点,涉及的遗址只有哈密白杨沟和锡格沁等处。

1913年,勒柯克编有图录《高昌》(*Chotscho*),以图版的形式介绍在吐鲁番寺院遗址中发掘的精美壁画等遗物。从1922年起,勒柯克主编的大开本论文与图版集开始出版,其总名称是《中亚与新疆古代晚期的佛教文物》(*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全书共7卷,每卷均有文物图版和专题研究文章。第6、7两卷的出版是在勒柯克1930年去世后,由瓦尔德施密特(E. Waldschmidt)主编。全套7卷到1933年出齐。这套丛书内容相当广泛,包括考察经过、壁画题材、洞窟形制、分期与年代、文化类型、人种与民族、社会历史等。其中涉及地面寺院主要是图木舒克塔格遗址。

奥登堡在考察之后仅写有简报《俄国1909~1910年的新疆考察》(*Русска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1909-1910 юца*),简单地介绍了他的调查工作,书中有地面寺院的照片,部分附有线图。

1915年在香川默识编的《西域考古图谱》中刊布出日本大谷探险队所获文物部分图录。1937年出版的《新西域记》刊录了探险队成员的个人游记报告,大谷探险队成员均非专业考古人员,其报告大多过于简略。

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

1960年以后,韩百诗(Louis Hambis)、M. Hallade等人根据伯希和发掘的材料整理并陆续出版了《伯希和探险队考古档案》,其中有《图木舒克》(*Toumchouq*)和《库车》(*Koutcha*)四本图录和著作。整理者依据伯希和留下的笔记和照片大致对寺院的情况进行了描述,对寺院里出土遗物也给予简单介绍。在研究部分里,整理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佛教雕塑风格的对比分析,对建筑形制和寺院的整体布局等情况也给予关注。

1995年,由迪亚克诺娃(N. V. Diakonova)根据奥登堡的笔记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藏品,整理出奥登堡当年在锡格沁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锡格沁》(*ИИКИИИИ*)一书。

对德国探险队所获文物的研究,主要是由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H. Hartel教授进行

的。但他的研究重点是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很少涉及地面寺院。印度艺术博物馆现任馆长 M. Yaldiz 著有《新疆考古与艺术史》(*Archaologie und Kunstgeschichte Chinesisch-Zentralasiens (Xinjiang)*) 一书，介绍了新疆的大部分地面寺院遗址。

关注新疆佛寺遗址的还有法国学者玛雅尔 (M. Maillard)。她所著的《西域的石窟和建筑遗存》(*Grottes et Monuments d'Asie Centrale*) 一书，除了论述新疆的石窟遗存外，还对塔里木盆地的地面佛教寺院做了讨论，但作者主要是介绍性的描述。

日本学者有关新疆佛教艺术的研究主要收于日本西域文化研究会主编的《西域文化研究》丛书第五卷。此卷名为《中央アジア佛教美术》，其中收集有熊谷宣夫的《西域の美术》、上野照夫的《西域の雕塑》，以及崛贤雄的西域旅行日记。

另外，奥地利学者 H. G. Franz 在其所著的《从犍陀罗到帕干》(*Von Gandhara bis Pagan (Kultbauten des Buddhismus und Hinduism in Süd- und zentralasien)*) 一书中，对佛寺类型进行分析，把新疆部分佛寺遗址归入“带回廊佛寺”一类。

近年对新疆佛教遗址进行探讨的学者主要有美国学者玛丽琳·马丁·瑞 (Marylin Martin Rhie)。她著有《中国和中亚早期佛教艺术》(*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 两卷，主要通过艺术风格的比较，对塔里木盆地的佛教遗迹进行比较研究和年代推断。从艺术史角度研究丝路佛教艺术的学者还有意大利 M. Bussagli 和印度 C. Bhattacharya 等人。

国内有关丝路北道地面佛寺遗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交河故城，孟凡人、贾应逸和李肖等人都撰文探讨过交河故城内佛寺布局和类型。晁华山教授在进行新疆石窟寺研究的同时，也对乌什吐尔地面寺院、锡格沁地面寺院和高昌故城地面寺院等遗址进行调查和比较研究。

以上有关新疆佛教遗址的发掘、调查和研究是本书研究的基础。

第三节 资料收集与实地调查

一百年来，有关新疆地面佛寺的研究大部分是在西方学者中进行的，文章数目已不算少数，但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当时发掘者对寺院遗址的描述和他们对年代的大致判断；二是后来的研究者根据这批材料，从艺术史的角度就部分雕塑、壁画做进一步的描述和更准确的年代判断。由于缺乏实地的考察，后来的西方学者很少从考古学的角度去探讨西域佛寺的形制演变。

国内学者虽然对新疆石窟寺的研究比较深入、细致，但是对地面佛教寺院的研究相对少得多。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存地面佛教寺院遗址残毁过甚，而早期发掘出来的考古资料大多散落于国外；另一方面是新疆地区考古发掘的艰辛和经费的缺乏，使得地面寺院的考古发掘不能全面系统地进行。

因此,对地面寺院的建筑形制和布局进行考古学研究仍是十分重要的。

笔者于2001年9~10月,在晁华山教授带领下进行博士生田野调查实习,主要调查了吉木萨尔的北庭高昌回鹘寺院,吐鲁番的伯孜克里克石窟、胜金口石窟和地面寺院、吐峪沟石窟、高昌故城、交河故城,焉耆锡格沁石窟和地面寺院,库车的库木吐喇石窟、夏合吐尔和乌什吐尔地面寺院遗址、苏巴什地面佛寺遗址、克孜尔尕哈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玛扎巴哈石窟,拜城的克孜尔石窟等多处佛寺及摩尼寺遗址。晁华山教授对每处遗址的调查都进行详细指导。通过这次实习,笔者对寺院的建筑分类、组合及布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2002年9月~2003年9月,笔者有幸获德国奔驰基金会赞助,在德国波恩大学研修一年。在此期间,笔者收集了德国、法国、英国、俄罗斯、日本等国有关西域佛教考古调查、发掘的报告及相关研究资料。2003年6月,笔者前往巴黎集美博物馆(Guimet Museum)调查伯希和所获新疆佛教遗物;7月,笔者赴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调查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在新疆获取的雕塑和壁画。通过对资料的收集和出土实物的调查,笔者对流散于海外的这批资料的年代和风格有了新的认识。

2004年3月,笔者再次赴新疆调查佛寺遗址,地点有吐鲁番的高昌故城、交河故城、胜金口地面寺院遗址和石窟、吐峪沟石窟,库车的苏巴什地面佛寺遗址,巴楚的托古孜沙莱寺院遗址,哈密的白杨沟地面寺院遗址、庙尔沟石窟和地面寺院遗址、小南湖佛塔等。通过这次调查,笔者认为早期的考古发掘报告大多不够详尽。在材料的运用上,首先得判断其准确性程度。实地的调查,比较当时的照片和遗址平面图,对核定这批材料的准确与否有着重要意义。所以,这次调查主要是核对和补充前人的调查、发掘资料。

总之,笔者力求能把收集到的相关材料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从而能对佛寺遗址作较客观、深入的研究。笔者选择天山南路巴楚的托古孜沙莱寺院遗址,库车的苏巴什寺院遗址、夏合吐尔与乌什吐尔遗址,焉耆的锡格沁地面寺院遗址,吐鲁番的高昌故城地面寺院遗址、交河故城地面寺院遗址、胜金口地面寺院遗址和哈密白杨沟地面寺院遗址等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地面佛寺遗址进行论述。《丝路南道的于阗和鄯善地区的佛寺遗址》笔者2001年写有硕士论文《丝路南道佛寺研究》一文,附于书后,请读者参照。

第四节 研究思路

本书主要按三个层次对地面寺院进行研究:一是对地面佛寺的现状进行描述;二是对寺院建筑遗迹的形制、布局、年代等内容进行分析;三是探讨当时的宗教和社会背景。

本书主要论述以下几点。

(1) 佛寺形制

研究主要综合四个方面:建筑的形制、壁画及雕塑的布局和题材、纹饰与遗物、艺

术造型与技法。前两个因素占主导地位。

一种建筑以某种形式出现,必然受建筑材料、自然环境、技术手段、建筑本身的功能和用途,以及审美心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在分类上本书侧重于根据建筑的功能和用途分类,此为宗教建筑首要考虑的问题。根据功能和用途,寺院可分为塔院、佛堂、经堂、禅房、僧房、塔墓六类。塔院和佛堂都是作为礼拜之用,经堂为高僧大德宣讲佛法之处,禅房则用于僧人禅定修炼,僧房是日常生活起居之所,塔墓是墓葬区。其中佛堂和塔院数目最多,形制复杂,可作为分期断代的主要依据,所以是本书的重点分析对象。

根据礼拜对象、礼拜方式、塑像安置方式等不同,寺院形制又可再进行多级分类。例如,佛堂根据礼拜对象可进一步划分为塔殿、像殿和塔柱殿三类;塔柱殿按佛像安置位置可分为像柱和龕柱两类;龕柱又可划分为正面开龕和四面开龕两类。如此可做更为细致的划分。这样的分类可以看出决定佛寺建筑形制变化的因素有三个:塔柱、台座和佛像的位置。这三个因素通过自身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进行不同组合,形成各种形制的佛堂。因此,本书的分类是建立在对此三个因素的重点分析上。

地面寺院的壁画及雕塑大多已被破坏,但可通过类型学比较的方法对其内容和题材进行判断。一是尚残余部分壁画及雕塑,通过和石窟寺较完整的壁画和雕塑比较,可大致知道其题材;二是壁画和雕塑残存无几,但还残留一些遗迹现象,可结合保存状况较好的、相同形制的佛堂来判断(如主室正壁上的桩孔和中甬道的台子可判断以前是否有立像和涅槃像)。这些内容题材也可进行分类,如说法类、涅槃类、因缘佛传类、经变类、千佛类、供养礼佛类、列像类、天王类等。佛堂的壁画和雕塑都是这几类题材的组合变化。

结合建筑形制和雕塑壁画题材,可以划分出不同的佛寺类型。这些类型可以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佛寺形制的演变;二是佛寺的族属问题。佛寺类型不同的原因可能是年代早晚不一样,也可能是同一时期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造成,也可能年代和族属都不一样。

(2) 佛寺建筑组合

在规模较大的寺院遗址中,建筑物相对位置的远近、排列和围墙等可以区分出不同的寺院。一座寺院往往由不同形制的塔院、佛堂、僧房等组成,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组合关系。和分析器物组合关系变化一样,我们同样也可观察不同形制佛寺建筑的组合是否有一定规律,不同形制的建筑类型在组合中的出现和消失是否有一定演变顺序。

(3) 寺院布局

寺院一般可归纳为塔院(或露天大塔)、佛堂区、僧房区三个基本要素的组合。其组合大致有三类:一是寺院布局以塔为中心,环绕塔而布置佛堂、僧房;二是寺院塔院单独出来,佛堂、僧房环绕庭院布置;三是寺院主佛堂位于庭院中心轴线位置,一般佛

堂、僧房位于庭院中心轴线两侧的布局。这三类布局存在演变关系。

（4）寺院族属

新疆历史上为民族迁徙、融合之地，许多民族曾共同生活于同一地区。这些民族的文化渊源不尽相同，因此在佛寺形制、雕塑壁画题材、寺院布局等方面也会有差别。

（5）年代

如果有考古地层学的叠压、打破关系，将是我们判断寺院间相对年代早晚的一个确凿的证据。叠压、打破关系反映到地面寺院建筑上，即是寺院的改建、重修问题，特别是寺院建筑在延续使用很长时间的情况下，这方面的痕迹会遗留很多。出土遗物中的钱币、文书铭刻和雕塑、壁画的内容、风格以及文献的记载等方面也是进行断代的重要依据。

（6）源流

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佛教传播不仅限于佛经教义，佛寺的形制、寺院的布局和佛像造像艺术也是其传播的主要内容。新疆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所以必须从整个佛教传播的时空大背景来分析新疆佛教寺院的发展变化。通过和周边国家，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我国西藏、河西走廊、中原地区在佛寺形制、布局等方面的比较，可分析论证西域佛寺的来源、发展以及自身的特点。

第二章 图木舒克地面佛寺

第一节 考古发掘与研究简史

图木舒克（Tumshuk）地面佛寺遗址包括托古孜沙莱（Toqquz-Sarai）和图木舒克塔格（Tumshuk-Tagh）两处地面佛寺遗址。托古孜沙莱地面佛寺遗址位于新疆巴楚县通往柯坪县的314国道旁边，距离巴楚县城约70千米。佛寺遗址东南500米处为托古孜沙莱古城遗址，南边约3千米为图木舒克塔格地面佛寺遗址。佛寺遗址西南约7千米处为图木舒克乡，这个乡位于现在巴楚51团农场和52团农场之间，早期考古文献一般以这个乡命名这处佛寺遗址。叶尔羌河支流和喀什河流经此处，由巴楚县小海子水库的水渠灌溉此处的农场。

1873年，福西斯（T. D. Forsyth）曾提及图木舒克遗址。1895年2月27日，斯文·赫定曾于此逗留，但他认为此处是穆斯林的遗址。1906年8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途经此地，随意用马鞭翻动废墟泥土，戏剧性地发现一尊具有犍陀罗风格的佛教塑像，由此确定此处为一早期佛教遗址。他立刻组织人员在此进行了三个多月的发掘（1906年8月28日~12月15日），主要地点是托古孜沙莱佛寺，对图木舒克塔格遗址也有零星发掘，收获颇丰，主要遗物为泥塑像，另有壁画、文书、陶器等，这些遗物现藏于巴黎集美博物馆。1913年6月至年底，德国人勒柯克再次到达图木舒克，重点发掘图木舒克塔格东、西两处寺院遗址（Le Cop, 1926a）²⁷⁻³³。其发掘所得的遗物现藏于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同年，英国考古探险家斯坦因也于此地发掘，他选择发掘的地点是拉勒塔格（Stein, 1928）⁸³⁰⁻⁸⁴¹。但他的成果显然不及前面两位发掘者。1928年9月，我国学者黄文弼也考察了图木舒克遗址（黄文弼，1958）⁸⁷⁻⁸⁸。他的主要成果是在图木舒克塔格的东山头南部山脚发掘僧人墓，内有多件陶质和木质彩绘舍利盒。

195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李遇春在托古孜沙莱古城发掘，获得北朝至唐宋时期很多遗物，但这些资料至今未见发表。

1989年和1991年，林梅村教授两次赴巴楚县调查图木舒克遗址，指出托古孜沙莱古城为汉魏盘橐城，为疏勒东境重镇，当地居民使用的语言可命名为“图木舒克语”（林梅村，1995）²³⁴⁻²⁵⁰。

伯希和在图木舒克的发掘只留下一些笔记，未作进一步的整理。直至1968年，才由他的学生韩百诗主编出版了图木舒克的报告（Hambis, 1961, 1964），内容包括当时的